



毛泽东著作 版本编年纪事

蒋建农 边彦军 刘 敏 张素华 著

MAO Z E D O N G Z H U Z U O
B A N B E N B I A N N I A N
J I S H I J I S H I

毛泽东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序《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龚育之

今年春夏，SARS 来袭，北京成为疫城，一时人心惶惶，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单位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就在这些非常的日子里，在北京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研究的边彦军等几位有心人，为纪念毛泽东 110 周年寿辰，接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利用防 SARS 提供的闲暇，编纂了一部大型资料书：《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

编纂者请我写序，我乐于应命。一是为了友谊，二是借此回忆一下与阅读和编辑毛泽东著作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从主办《湘江评论》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以鼓吹“民众的大联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过花甲了，他一度设想不但要从国家主席而且要从党的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下来做什么？他的首选，还是做个著作家，在报上写专栏文章。

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二)

毛泽东著作编成选集，还是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

1984 年 4 月我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曾经应邀向外国

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介绍毛泽东选集版本的情况。我提出一个观点：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原盖出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从这两本书中选出来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党中央的许多指示；包括代表正确路线的文献，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经过研究党的历史，经过起草、讨论和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毛泽东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这样，把搜集在那几本党的历史文献集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加以编印，就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了。

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编辑毛泽东选集，各解放区倒是纷纷先做了起来。

我向施拉姆介绍了那时各解放区先后或同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五个系统。一个本子在一个地方出了，其他地方照样或基本上照样重印，算一个系统。我说的五个系统是：一、晋察冀日报社 1944 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把大连大众书店 1945 年、渤海书店 1947 年重印，晋察冀中央局 1947 年增订、冀东和太岳重印的，都算在这个系统内）；二、苏中出版社 1945 年编印、胶东 1946 年重印的《毛泽东选集》；三、山东 1947 年编印、渤海 1948 年重印的《毛泽东文选》；四、东北书店 1948 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五、晋冀鲁豫中央局 1948 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这个介绍，只是根据文献室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其他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

现在这本《编年纪事》，在附录一中详细介绍了建国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编辑体例和所选篇目。不过没有提到《毛泽东文选》，大概是因为它不叫选集，篇幅也较小的原故吧。

（三）

我向施拉姆介绍时还提到香港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1948 年秋天，我在香港读到过。那时，我在上海考完了大学，等待发榜。原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龚饮冰，奉命撤到了香港。于是我到香港我父亲那里作了短期逗留。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有半公开活动的相当空间，办了不少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报刊和出版社，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在这里可以公开发表，我得到了饱读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在长沙读中学的时候，读到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那是公开的；读到过《论联合政府》，那是私下流传的；读到过日本投降时

《第十八集团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也是私下流传的，而且只知是朱德的电报，对其口气和文风（对蒋介石称“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却不知是毛泽东的手笔。

在香港，我读到的是冠以《毛泽东选集》总名的一系列单印本，我只读过其中几个单印本，远没有读“全”。

1948年10月初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参加了地下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啊，在进步学生间私下流传得就相当广了。毛泽东著作极大地吸引着我。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八百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

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脆，因为要查阅毛泽东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得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四)

195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选，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1949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的确作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动议以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首编稿1949年5月6日已经发稿。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6月底就会出版，希望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

但是，因为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

据即将出版的逢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生着土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一百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1951年7月开始，已经编定的校正本毛选，第一卷的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10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份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不过，这书的出版，距过去通报苏联的时间（1949年6月底），已经推迟两年多了。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券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1960年才出版。

这一卷显然是重新编过的，内容同原来设想的不同，只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1960年2月底到3月初，带领几个人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不像在石家庄那次那样，毛泽东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自己做编辑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审读别人帮助整理的文稿，审读别人起草的题注和注释。

我是先从父亲那里看到第四卷的清样本的。他那时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出版前给他们传看了清样本，但在他手里只能停留几天，而我以先读为快，就拿过来连夜读完了我没有读到过的那些文章。很快，我也拿到了这本书，机关里给一周的时间要干部学习。对于其中那些从前发表过的著作，我从容地对照着从前的版本读，发现有不少修改。我仔细地在书上标记出这些修改，思考着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谈学习体会时，我谈了这些发现。我自以为学得很认真，没有想到，领导上却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这种学习态度和方法，说是没有集中精力领会选集的精神实质，却去搞什么版本比较！

（五）

第四卷出版，包括建国以前毛泽东全部主要著作的毛选四卷就出齐了。

是不是接着就要出版毛选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

1962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1956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1964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从毛选四卷中选出若干篇，又从建国以后的著作中选出若干篇，供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建国以前著作那部分，主要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这是编毛选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篇重要著作，1961年已经在党内印发过；建国以后著作那部分，有过去已经在报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新整理发表的。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包括建国以后若干篇重要著作的选读本，可以满足急迫的需要，毛选第五卷的事还是没有摆上议事日程。

这时还出版了一部（两册）很有用的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附以类似索引的“各篇细目”，是田家英主持编成的，不过仅限于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著作，而且仅限于内部发行，不得外传。

经不住不断提出的进言和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可以选择他建国以后的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一篇篇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于是，1956年讲的《论十大关系》，于1965年12月在党内印发了，印发时中央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份整理稿还不满意，先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将来修改。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讲话），1966年2月在党内印发了，这是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之后，王任重最先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经彭真、陆定一、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推敲修改，再经毛泽东认可，才发出的。我因为参与准备《二月提纲》，跟随许立群到了武汉，偶然地得到机会，参加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推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其间的情形和故事，我都记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这篇回忆文章中。

（六）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陷入准无政府状态。红卫兵是不顾一切的，他们也不顾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一件政治上非常严肃的事情，私下印行了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集。开头还只是把毛选以外的、曾经在各种报刊和小册子里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汇印在一起。后来就把从抄家中抄来的高级干部所存的中央文件和学习资料中，从他们所记的党内会议传达记录中，把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讲话记录，汇印在一起。

我那时虽然关了牛棚，有时还可以回家、上街，我的妻子孙小礼是北京大学的教员，“黑帮”家属，当不了造反派，算是个逍遥派，也利用一切机会，帮我购买和搜集红卫兵小报和红卫兵印刷品，特别是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在牛棚里，棚友之间还可以交换各自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这类印刷品。记得我见到的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有叫《资料汇编》的，有叫《学习资料》的，有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毛泽东文选》的，有一大本的，有几大本的，北大编印的是四卷本，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有七卷本。还有许多散篇油印的，那都是我的妻子帮我弄来的、北大各种战斗队的传印本。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种我所没有的毛泽东著作汇印本，持有者却怎么也不肯出售，要用他喜欢的毛主席像章交换，我只好把我儿子的珍贵像章拿去交换。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儿子直生气，我直对儿子道歉。

这类的毛泽东著作集，我得到不少，还借来不少。我把我得到的本子上没有的文章，都抄录下来。反正在我们那个牛棚里有的是“学习”时间，看管牛棚的人认为抄录毛泽东著作是学习，也不加禁止。这样，我就自行编辑毛泽东著作集，只供自己阅读。其中有铅印的，有油印的，有手抄的，统一按时间次序排列起来，分装四大册，目录就有厚厚的一叠。

“文化大革命”后期，整顿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印制毛泽东著作被宣布为不合法，几次言明要禁止和销毁。所以，谈毛泽东著作的正式版本，都不会提到它们。但是，尽管不是合法的出版物，却是实际存在的印刷品，流行颇广的印刷品，听说，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的机构的图书馆里收藏得不少。中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概也收藏得有吧。

（七）

“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央是不是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呢？1970年批陈伯达的时候，涉及他在编第五卷时的错误，但没有听说他是瞒着中央的。

1975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1975年10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

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党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写得很好，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1966年2月参加整理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1962年10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1962年1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运动”。这时，政治研究室已经

处境不妙，只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给我几天时间，读完已经给我看但还没有看完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的档案，李鑫同意了。李鑫还交待，我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在外面讲，教育部也不得过问。

这样，我回到了教育部。我向当时教育部的负责人、十届中委的工人委员周宏宝，讲了毛选编辑的情况外面不得查问的领导交代。周宏宝倒是个爽快人，说，既然有这样的交代，就这样办吧。这使我在批邓运动中省去了多少麻烦！而政治研究室在批邓运动中，却是个麻烦之地。不过，我只是零星听说，不是亲身经历，就不去说它了。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脚着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6月我父亲病危、逝世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7月8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批邓反右旗鼓，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八）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馆，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还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教育部里传说，是调我去参加清查“梁效（两校）大批判组”；我猜想，是调我去毛选材料组。报到才知，是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负责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是叶剑英同华国锋、汪东兴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促成的。而身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曾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过要解决“四人帮”的建议。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

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上述那两项决定。

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可能会有中央交办的其他事情。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1977年4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

选集组准备继续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全集组准备汇编建国以前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资料。我虽然不在这两个组，但参加了有关的工作，主要是看了毛泽东1957年以后（即第五卷所选文章以后）的著作和讲话的档案，参加了拟议中的第六卷的选稿的讨论。

（九）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为这次中央全会做准备的、持续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亲历了这一伟大历史过程。

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选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第五卷不再发行了。

能不能加以修订，重新出版？很难。

第六卷的选目能不能确定？相应地也很难。

全集怎样出，出不出？虽然不急于决定，也很难。

汪东兴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胡乔木接任主任。李琦来，接替李鑫为常务副主任。1980年初，廖盖隆和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党的文献的编辑任务范围扩大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编辑都包括进来了，但是，编辑毛泽东著作仍然是文献研究室的一项主要任务，需要有一个新的全盘规划。

（十）

1984年我接待施拉姆，不但向他介绍了毛选过去版本的情况，也向他介绍了毛著今后编辑出版的规划。

我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目前计划出一系列专集。已经出版了三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将要陆续出版的，我说了毛泽东文艺工作文选，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文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的早期著作集。还提到要新编一本包括毛泽东建国前和建国后最重要著作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我没有直接回答施拉姆关于选集第五卷是否修订、第六卷第七卷是否出版、全集是否出版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告诉他，那些计划已经搁置了。

我没有告诉他的，是另外一项计划，即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编辑，同选集和专集的编辑方针不同，不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而是基本上包括全部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的，都收集在内。但不收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因为这个不同的编辑方针，它只是内部发行，不算公开出版。

（十一）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毛组的同志们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87年开始出版第一册，到1988年我离开文献室的时候，已经出版或付排的又有几册。前三册都在书后附有一篇在我主持下和毛组的同志一起写的长篇编后记。从第四册起，后记取消了。

离开文献室，完全非我所愿。领导方面通过几个途径几次同我谈，要我到中宣部去，我几次表示不愿意，最后一次我还专门写信向一位中央领导陈情。没有得到答复，却来了正式的调令。作为共产党员，只有服从。到中宣部以后，我还关心毛著的编辑工作，文献室也表示欢迎，请我继续帮他们审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清样，直到1998年出齐十三册。这可算是一项大工程。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专集除向施拉姆介绍已出的三种以外，毛组的

同志们又陆续编出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胡乔木亲自主持下，有文献室的同志参加，编出了《毛泽东诗词选》；理论组的同志们编出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我都是参与其事者。

毛组的同志们还同湖南省委的同志编出了《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这两本书的编辑，可费了周章。第一本书还好编，第二本书就遇到了困难，即怎样对待已经选入《毛泽东选集》而毛泽东在出选集时又作了改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毛选》中经过修改的版本吧，又同其他文章选用当年最初发表时的原版本不相称；用当时发表的原版本吧，又显得没有尊重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版本。经过多少讨论，多方考虑，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两篇文章（是《毛选》中仅有的两篇大革命时期的文章）选用《毛选》的版本，同时附上当时发表的原版本。我担心这个方案也许得不到批准。没有想到，乔木不但同意收入原版本，而且批评我们以毛选版本为正，附以当时版本的做法。他主张在这个集子中应以原版本为正，附上毛选的版本。我们当然很同意这个科学的、勇敢的方案。事情似乎就可以定案了。我到中宣部后，还带着文献室的一些同志出差到湖南，同湖南的同志商量最后完成编辑工作的事。两书的即将出版，还由新华社在报上发了消息。

可是，编辑工作拖延了一下。1989年以后，领导意见有了变化。这两本书不让出版了。我也不负责这两本书的事了。后来知道，《毛泽东早期著作集》改名为《毛泽东早期文稿》，这改得好；并改为内部发行，这个改变有什么必要呢？早期文稿中又没有收入毛选时作了修改的文章呀。后来知道，领导已同意此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可湖南的出版方面，不知是出于发行量的考虑还是什么别的考虑，在内部发行了一版以后，并没有再公开发行这部本书。所以，在这本《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还只能说它是内部发行。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听说，制好的版也不存了！

（十二）

我离开文献室后，还帮助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此书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多次出版过的。这次作了较认真的增补和修订。从文献室随我调到中宣部的宋贵仑，在我的指导下做了这项工作，文献室的同志负责审定。我还处理过一项与毛著版本的选用有关的事，那就是出版社要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部分要选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哪个版本呢？按此书作为历史文献的体例，以选用当

时发表的原版本为宜，但不选用毛选中经过作者修改的版本，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出版社没有把握，向中宣部请示。我同文献室的同志联系，同意出版社在这部历史资料书中用原来的版本。

文献室还陆续出了一些其他的毛泽东著作专集，其中的《毛泽东诗词集》和《毛泽东文艺论集》，我参与过意见。对毛泽东诗词，我主张还是出选本，对过去的选本可作一些增补，不必出诗词全集。后来他们取了个折中，不称全集，也不称选，增加了较多诗篇。《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的更进一步的增订，我建议增加一组集纳的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还建议加上毛泽东 1937 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1982 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 周年的时候，文献室的同志曾是选出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几十封信件，先在征求意见的《文献与研究》试刊上刊登，其中包含给周扬的这封信。周扬很赞成公开发表这封信。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则不赞成，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有些提法有毛病。最后以纪念活动不必发表这么多信为理由，决定从中选出一批信，其中不包括这封信，予以公开发表。周扬发现没有发表给他的那封信后，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向他作了说明，还说，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同意把这封信收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中，只是不同意这时挑选出来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来，要出《书信选》了，还是没有得到同意收入。这次出《毛泽东文艺论集》，征求我的意见，我旧事重提，建议把这封信收入，得到了同意。

至于文献室出的《毛泽东军事文集》（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六大卷），《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八卷，我都不是参与者，而是个热心的读者。

《毛泽东文集》八卷，是毛著编辑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它的特色之一，是整理发表了毛泽东许多重要讲话和谈话的记录，它的困难也在这里，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整理他的这些记录稿不可能得到他的首肯了，编者就需要特别地谨慎从事。记得在 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引用毛选第五卷中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论断来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发言向大家说明，所引的话，不是毛当时所讲的原话。原话本来是把阶级斗争同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类，编第五卷时，编者作了修改，用毛泽东 1957 年底的观点（“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代替了

1957年初原来的表述。而这篇整理稿，同《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不同，是毛泽东没有看过的。我这个发言引起了注意，不过有同志误以为是我改的，其实我只是知道做了这样的修改。《毛泽东文集》中选了这篇讲话，我很关心编者是否复原了这句话的原样。拿来一看，编者很用了心思，他们把包括修改过的这句话的整个第五点，都没有选进来，而在注释中说明：只选了这篇讲话的第一、二、三、四、六、七点。

(十三)

最后，谈一些随想。

由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只收毛泽东亲笔的文稿或亲自审定的记录稿，所有没有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都没有收入，而《毛泽东文集》虽然收了许多讲话谈话记录的整理稿，但篇幅还是有限，特别是选稿的方针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所以，还有大量讲话谈话记录稿没有编入。这些记录稿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内容，或者包含着重要的为了解毛泽东的思路不可少的内容，读者都看不到，怎么办呢？《毛泽东年谱》以摘引的方式，公布了相当多的在文集中没有收的讲话和谈话的摘录，对读者很有用处。这本《编年纪事》注意到这个情况，对《年谱》中的摘录文献也予以登录，这是很好的。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又摘引了没有发表过的许多讲话谈话记录，这本《编年纪事》恐怕就来不及补充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尽可能完全地补充进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文献室同湖南合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有湖南同志做的主要人名、团体、事件、书报期刊索引，查找起来十分方便。可惜，其他的毛著集子，不论是文稿、文集还是选集、专集，都没有索引。国外的学术出版物很注重做索引，我们这里还缺少这个习惯。这是编辑工作、出版工作落后的一种表现。希望今后出版或修订毛著的各种集子，都能做得像《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样好。

第三点：前面几次提到施拉姆，现在还要回到施拉姆。今年12月5日到7日，为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将举办一个研讨会，同时这个会也是为施拉姆主持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全部著作英译完成而召开的。我受到了邀请，但是很遗憾，因为医生不允许，不能赴会，只能遥祝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我称它是一个巨大工程，不是夸张之词。此书我已收到四本，每本一巨册，厚的厚度近两寸，页数近一千；全部完成，总数将达十巨册。先前，日本的竹内实主持完成的《毛泽东集》十册和《毛泽东集补卷》八册，不限于1949年以前，而是覆盖毛泽东的一生，

也是一个巨大工程。日本的《毛泽东集》，收集的是毛泽东文献的中文原文，施拉姆的集子，是把毛泽东文献译成了英文。日本的集子的一个特色，是用编辑符号标示出文献不同版本所作的修改；英译本则全据最早发表的版本，而在注释中说明后来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施拉姆的本子，各卷后面都附了索引，这是很值得称道和借鉴的。

第四点：前面说了，毛泽东作为一个著作家，只愿意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整理，交给读者，传之后世。他不赞成出他的著作的全集。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伟人，人们要了解他，研究他，要尽可能完全地搜集他的著作和讲话，要考证和比较他的著作的版本源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著的编辑和出版，是不是要考虑各种需要，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回忆往事，读毛和编毛，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从1975年10月，到1988年春天，除了中间不到一年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所打断以外，十二年时间，我都在毛著编辑的岗位上。此后，也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这些回忆，在我，是值得珍惜的。

忆往是为了思来。希望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在编辑方针、方法、体例各个方面，不断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所开拓，与时俱进。这是一个老文献工作者衷心的期待。

2003年11月14日于万寿路寓所

序言二

张静如

今年是毛泽东 110 周年诞辰纪念，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同志，大多在想搞点什么。这不只是为了抒发感情或发些什么感慨，大家都在考虑的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纪念毛泽东，如何推进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内在联系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产生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摆脱了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影响，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中，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赋予了其解放思想的新内涵，谱写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光辉篇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中，又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特征，展示出这条思想路线的旺盛生命力。我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这是贯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的一条主线。

我们党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是全方位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生不息的广阔发展前景。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推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搞好这方面研究的关键，我认为就是结合各自的工作，认真研读领袖人物的原著。这是搞好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我很赞成宣传要有声势，但一定要坚持要有研究做基础。当然也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写宣传文章的同志，都必须先成为理论家才能写文章。最近，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有些文章，内容比较空

泛，缺少新见解。这除去实践经验上的缺乏之外，恐怕主要是研读原著不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其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其间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我有一个体会，每隔一段时间，从一个新的实践高度，即使重新阅读过去读过的经典著作，仍然能得到新的体会，受到新的教益和启发。所谓常读常新。蒋建农、边彦军、刘敏、张素华同志编写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对于读者检索、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提供了方便，是一本值得重点介绍的学术性工具书。

这部书稿大约有 350 万字，我没有全部阅读，只是粗略地翻了一遍。但有这么几点印象：

一是比较系统。整部书稿以建国前后各出版单位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毛泽东单篇著作为编写线索，涉及毛泽东自 1912 年到 1976 年间撰写和发表的著作 7571 篇。把这些著作的篇名和发表时间逐篇排列出来，本身就是一件大功德。更何况这四位作者还要逐一写出这些著作的源流、字数、手稿或原件的收藏单位、出版发表情况和历次发表时的修改情况。这是件很不容易同时又很有意义的工作，据我所知，尚未有过这样的书籍出版。

二是学风比较严谨。搞版本研究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要说在眼下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有些青年学者的学风比较浮躁，即使是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真正潜心从事史料学、版本学研究的也为数不多。搞版本研究经常是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很多资料，运用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但落在纸面上的没有几个字，也谈不上什么思想性和可读性。不仅如此，而且一旦有新材料被发掘（对于党史学来说是被公布），你的成果很快就要补充、修正（甚至是被纠正）。但是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版本研究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我在翻阅书稿中留心看了一下，这部稿子涉及的报刊不下百种，引证的书籍恐怕数以千计，还有一些外文资料。据此书的作者之一蒋建农介绍，他自己历年收藏的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就有 100 多种。从书稿的内容看，写这部稿子绝不是一日之功，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积累和研究。还需要强调的是，据我所知，他们都曾有机会接触毛泽东尚未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稿、电报和讲话，但他们没有妄用这一方便，而是坚持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为编写对象。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学风严谨的表现。

三是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部书稿的学术含量，不只反映在史料挖掘上，还反映在作者的综合研究能力上。比如书中关于每篇著作的提要，作者在有些篇目下写的是“这是毛泽东起草的……”，有些写的是“这是毛泽东